

永忆有情游 ——纪念昌平先生

康韵梅

昌平先生的办公室,书籍遍布,洋溢着浓浓的烟味和茶香,虽然是一间非常平凡古旧的屋宇,但其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让人喜欢的文人气息,此后我跟昌平先生偶有书信往返,“瑞金二路”的地址每每让我联想到那间总编辑办公室。

5月21日早上,带着点周一忧郁来到研究室,才坐下,收到中国政法大学赵晶教授和北京大学杜晓勤教授两人间隔不到一分钟传来昌平先生离世消息的微信。顿时惊愕,难以置信,难道昨晚莫名的辗转难眠竟是此一噩耗的征兆?在不断的讯息涌入中,泪水终究溃堤,与昌平先生相处的种种往事,则历历浮现脑海。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海峡两岸局势趋于和缓,学界之间的交流日渐频繁。我与大陆学者互动来往,主要结缘于大陆唐代文学学会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唐代文学国际研讨会。2000年奉先师罗联添教授之命首度参加后,除了2004年在广州举办的会议未与会外,其余会议无一次缺席。认识昌平先生就是在2000年10月的武汉会议上,因为是第一次

到大陆参加学术会议,总是张大眼睛看着相对陌异的人、事、地、物,而昌平先生身着白色西装外套的翩翩风度和和煦的笑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图一)。多年后,他告诉我在会议结束游览武当山时,他和尚君先生在武当山下旅店外的街道上购买纪念品,当时他买了一把好长的剑,要带回家给公子,而我在旁好奇地观看他挑选长剑时如小女孩般

的纯真表情,则让他印象深刻。也许就是这一印象的缘故,十几年来,昌平先生对我这学界小友,总是爱护有加。

昌平先生的喜好购物,众所周知。2008年10月在芜湖举行的唐代文学会议,大会特别安排至黄山一游。在抵达黄山市的晚上,饭后我和同事好友黄奕珍教授,跟着昌平先生和尚君先生一起逛屯溪老街,一路我们欣赏

着各种歙砚,也听两位前辈的品评。记得尚君先生买了一方太白醉月砚,造型极美,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一家卖特产的小店,店家沏茶招待,并开始推销茶叶、木耳、香菇等特产,昌平先生喝着茶,一边听着店员小姑娘的介绍,便开始一一批评茶叶和小姑娘拿给我们挑选的各种特产,

(下转14版) ➔

◀ (上接12版)

唐诗秀朗浑成、兴象玲珑之格调形成的主要成因。我后来撰写《论开元诗坛》一文时,虽然重在解释殷璠这句话中“声律风骨始备”的内涵,但其中注意到开元二十三年前后另一批著名文人进士登第与文儒的关系,实是受昌平兄此文的启发。这篇论文中以兴象、气脉论诗的观念,以及重视初盛唐朝廷诗风影响的思路,同样体现在他的另一篇名作《上官体的历史承担》中。“上官体”向来被视为初唐四杰文学革新的对立面,几乎没有人关注其诗歌创作。昌平兄联系龙朔年间对上官体的不同评价,注意到小谢体受到重视的现象,认为当时朝廷诗坛实际上面临着如何用六朝声辞来表现新朝气象的问题,上官体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并结合高宗朝文化氛围由儒向文的转变,根据上官仪编撰《笔札画梁》中提出的“六对”“八对”和“六志”,重新解读了其诗“绮错婉媚”的内涵。接着文章顺势而下,通过分析上官婉儿对沈、宋诗的评判,指出从上官仪到婉儿,朝廷雅体这一脉如何吸取六朝诗特别是小谢体的精髓,直接影响到盛唐诗的演进。这些论文观察问题视角独特、思考周密、论述辩证,屡屡受到日本著名唐诗专家松浦友久先生的称赞,也常被本段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所引用。

在研究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方面,昌平兄也是开风气之先的。他在《从初盛唐七古的演进看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一文中指出,“对于唐诗繁荣的原因及其规律性的研

究,实际上往往有以外部因素,即以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的研究,代替对更为重要、更为复杂的诗歌演进内在规律的研究之倾向。抽象的、宏观的探索,应当以具体的、微观的分析为基础。”这一见解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他在该文中提出初盛唐七古有三个先后相生、不可分割的发展阶段。在分析这三个阶段的不同特色时,他着重从赋对初唐七古的影响、盛唐七古句式声调的骈散相间、意象的体物探象,布局取势的纵横驰骋等方面总结出唐诗发展的一些规律。我后来也写过《初盛唐七古歌行的发展》一文,正是在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七古歌行的源起,以及歌行和七古体式的构成原理,可与他的论文相互补充。他又写过《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渊源》一文,最早指出七律的形成与初唐应制唱和风气的关系,成熟于中宗景龙年间的背景,蜕化于骈俪化的歌行的风格渊源。我后来在写《论杜甫七律“变格”的原理和意义》时,就在他的结论基础上论述了七律“正宗”与乐府歌行和应制诗在声韵和格调方面的关系。

我与昌平兄的专业方向都是汉魏六朝隋唐文学,又都侧重在六朝到初盛唐这一段,学术理念一致,研究思路相近,共同语言很多。我们都很关注文学史中一些较为深层的呈阶段性发展的创作现象,偏重于在微观的基础上进行“中观”的研究,对于具体作家的研究则较少。但我们也都从不同角度研究过李白、王维等大家的若干问题,兴趣和话题始终保持一致。当然偶尔也有争论,不过绝

不会伤和气,反而更加重视对方的不同看法。90年代末他在策划《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这套丛书时,还特地来信建议由我写《杜甫诗选评》,他写《李白诗选评》,藉以纪念我们的学术友谊。我欣然同意。这本小书也促使我后来继续探索杜诗艺术和辩体的关系,写了一本新的专著。可惜我再也听不到他对这本书的意见了!

昌平兄是一个有至情至性的人,是那种责任心极强的、非常老派的上海绅士。上至父母、师长、下至朋友、晚辈,都能竭诚相待。他是个孝子,在家里是长兄,虽有姐妹和弟弟,但父母一直跟他一起生活。80年代我第一次拜访他家时,他还住在简陋的两居室里,小卧室给已经长大的儿子住,父母住大卧室,他就和夫人包国芳打地铺。这样的窘境一直到他当了总编,社里给他解决了一套三居室才有所改善。但即使如此,仍然住得很紧张,因他父亲有帕金森氏症,须有保姆照料,日常的生活都要以病人为中心。由于他和夫人的悉心侍奉,两位老人家均以寿终。他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高考恢复时,他一个个为他们复习功课,帮助他们全部考上大学。我曾经笑说他无论在社里还是在家里,都像是巴金笔下的“觉新”这个人物,他对此倒是默认的。

对于老师,昌平兄总是一心想着帮他们做点事,回报他们的知遇之恩。他和马茂元先生合作《唐诗选》的故事,已为学界所熟知。林庚先生九十大寿时,他帮助重版了林先生早年备受批判的《诗人李白》,并

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名义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新版说明》,高度评价了林先生在此书中提出的著名论点,林先生非常高兴。他还屡次对我说,一直很想为施蛰存先生做点什么,但施先生从来不让帮忙,为此一直觉得遗憾。我的导师陈贻焯先生去世时,他特意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名义定了一个鲜花做的小花篮,嘱咐我一定要放在陈先生身边。其实,陈先生在上古社出版《杜甫评传》,主要是由陈邦炎先生负责,和昌平兄并不熟,但昌平兄认为自己既为总编,就要尽到向师辈作者致敬的心意。

对待一般关系的作者,他的认真负责更是令人佩服。我在香港浸会大学任教期间,文学院院长曾提出邀请两位身兼出版家和著名学者双重身份的内地专家来系工作两周,帮助教师们提高科研能力,昌平兄是其中之一。他到任后,不但认真审阅老师们提交的每篇论文,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改意见,每份批语至少在两三页以上。我说他太过认真,他却说既然请他来,当然要得对得起人才行。况且已经形成习惯,在社里看稿时常常如此,最多的一次修改意见长达一万多字,相当于自己写一篇文章了。我建议他把这些审稿文字收集起来,将来成书出版,也是很有益于学界的。他没有在意,可惜现在都散失了。昌平兄这次来浸大,还帮助一些老师将改好的论文发表在内地刊物上,给老师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过了两年,文学院又提出邀请内地专家的建议,全系老师一致要求昌平兄再次来系,于是又有他的第二次浸大之

行。日前昌平兄去世,浸大中文系致送的唁函,充分表达了老师们对他的深深感念。

我和昌平兄的夫人也早就熟识,深知他们伉俪情深,老而弥笃。2014年国芳做过肺部切除小结节的手术,当时以为并无大碍。2016年冬在复旦大学我和他们夫妇再次见面,国芳的情况看起来还不错。谁知去年八月,就接到昌平兄来短信,告知国芳已经因肺栓塞猝然离世!国芳是典型的贤妻良母,陪伴昌平兄58年之久,无论是长久的别离,还是生活的煎熬,都从无怨言。好不容易等昌平退休,可以安稳地共享晚年了,却撒手而去,昌平兄的极度悲痛是可以想见的。朋友们都为他担心。12月,我利用到复旦大学开会的机会去看望昌平兄。他在书房里为国芳设了一个“花之海”,用鲜花将国芳的遗像围在中间,每天更换鲜花,每顿饭更换供品。又写了大量的悼亡诗,每天晨起和睡前对着遗像朗读。拜祭过国芳后,我们在他那间陈旧的客厅里,长谈了七个小时。为了让他缓解悲哀,我努力把话题转到学术上来,告辞时我觉得他已经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情。回到复旦宾馆后,还向焦急等待消息的尚君兄报告了探访经过,大家都稍放宽心。又怎能料到才几个月,他就匆匆随夫人离去!告别会前夕,上海连降暴雨,想必是老天也在为他痛哭吧?

昌平兄未完成的唐诗史,已成绝笔。但他的学术理念会与他的传世之作一起,继续影响后起的学人。他的音容笑貌,也会永远鲜活地留存在知交们的记忆之中。(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